

因为热爱

□文龙生

仔细想起来,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,伴我成长伴我快乐的朋友,是书,莫过于书。

我家不是书香世家,祖上父辈们未留下什么藏书。我热爱书,与书有缘,还有一段辛酸史。我上小学第一天看不到黑板上的字,才恍恍惚惚知道自己是个近视眼,一只0.5,另一只0.2。说来很怪,看书几十年,不管走在路上睡在床上坐在车上,也不论灯光强弱,照看不误,但眼睛至今还是老样子,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差。那时家里穷,买不起眼镜,不戴眼镜的近视眼读书很可怜,哪怕坐在第一排,黑板上的字模模糊糊,老师板书指教未能受益不说,还常被批评,说成绩不好又不抄笔记。真是天大的委屈!我的十年寒窗是在一种难言的误解、委屈和痛苦中度过的,即使上大学也如此。至今夜里还不时从那检查笔记、考试测验的噩梦中惊醒。

古人说得好,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看不到黑板上的字,就得逼你下课翻书,久而久之,养成爱翻书习惯,自学能力不知不觉、莫名其妙得到提高。因此,经常感慨而言: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就自学的,只是不才罢了。

但热爱读书,是从看小人书(连环画)开始的。文革时期读小学,学校上课不正常,上街看小人书成了最大的乐趣。那时候,安顺好几条街都有租看小人书的书摊,很便宜,先一分钱二本,后两分钱三本,再后一分钱一本。那些小人书,杀仗的、打仗的、神话的、爱情的,古今中外,应有尽有,且内容丰富,绘画生动。特别是那些名著改编的,多有几十集,吸引人得很。每天背起书包不进学堂进书摊,看着迷了常忘记回家吃饭。培养我的读书兴趣,这些小人书功不可没。

文革前夕,舅舅因家庭成分问题,失去工作,以收荒货谋生。破“四旧”,许多人家将大量书籍当“荒货”贱卖,几分钱一斤。舅舅收到不少文史哲书籍,有的还是名著。我几乎每天跑到舅舅那收荒货摊挑书,三国、水浒、西游、说唐、说岳等就是那阵子懵懵懂懂读完的,还谈不上知半解,可故事情节如今仍大概记得。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名字、绰号、星宿全背得滚瓜烂熟,觉得好玩有趣,能够和同学甚至大人们吹牛。还有《红旗谱》、《三家巷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保卫延安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暴风骤雨》、《红岩》等红色名著,读得津津有味、废寝忘食,多次在昏暗的灯光下熬红了眼。可以说,我们这代人是读“红色小说”长大的,那些“红色乳汁”养分至今尚在。《红楼梦》、《西厢记》也走马观花浏览过,老实说,读不懂,也无兴趣,但《红楼梦》“一朝春尽红颜老,花落人亡两不知”,《西厢记》“待月西厢下,迎风户半开;拂墙花影动,疑是玉人来”这些诗句,囫圇吞枣背过,今天还记忆犹新。舅舅的好些“荒货”,被我有借无还,逐渐成为自己的藏书。

那时候,许多名著都是“毒草”,不允许阅读,大家都是悄悄传阅。记得有个同学家藏书很多,他偷偷借我几本巴金的小说,小心翼翼地嘱咐,你个人看就行了,别借给他人,听大人们说巴金是个“流氓作家”!文革初上语文课多是朗读背诵毛主席语录,有次大家正在背诵语录,我往书包里偷看小说《青春之歌》,老师发现后当即没收,还说出上纲上线的话,害我几天夜提心吊胆睡不着,书是给人家借的不说,最怕的是犯大错啊!

七十年代插队农村,我的行李除简单铺盖、锅碗瓢盆,各类书籍占了大半。或休息或高兴或苦闷之时,看书就是最好的消遣。毛泽东著作、诗词、鲁迅杂文、郭沫若、艾青的诗歌、茅盾、巴金的小说、秦牧、杨朔的散文,巴人的《文学论稿》,高尔基、法捷耶夫、托尔斯泰、歌德、拜伦、巴尔扎克等外国名家名作,还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唐诗选》、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、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》等等,青山绿野间,煤油灯下,捧起这些好书,真是莫大享受。那时读书,虽如陶渊明所讲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,但伴我度过了难以忘怀、不可复制的蹉跎岁月。更重要的是,如饥似渴读这些书籍,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和力量,恢复高考,参加了1977、1978两次考试,或入围或录取。上小学中学时,我成绩平平,根本不入老师的法眼。知道我高考的情况,有人“老眼光看新问题”,对此很是疑惑。我只好这样解释:读不好学校的功课,可热爱课外书籍,也许上帝就开了扇窗吧!是啊,知识改变命运,千真万确。但课堂上获取知识不是唯一的,自学也能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,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如此。

爱读书也是工作需要。25年前,从教师改行到报社当记者做编辑。过去虽在报刊发表一些文章,但那是文史、随笔类的东西,与新闻沾不到边。新闻这碗饭不好吃,当不得南郭先生,得老老实实从头学起。除了向其他搞过新闻的同志学习请教,更得力于书本这个“无声老师”。新闻业务书籍,特别名记者编辑的佳作,就是学新闻的好老师,书店买不到就在报刊上“发现”购买,那时还没有网上购书。学习或出差在外,我最爱逛当地书店,挑选各类书籍,新闻业务书当属重中之重。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写来也会吟”,经过这些好书熏陶和多年实践磨炼,我从门外汉逐渐变为报社业务骨干。

读书,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经常到书店或网上购书,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类的,每年花上千元在所不惜;还订阅《读书》、《随笔》、《书屋》、《纵横》、《博览群书》、《名人传记》、《中外书摘》、《文史精华》、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等十多种刊物。我的阅读观是多多益善、开卷有益,连那好像与读书人不沾边的《拳击与格斗》,我不仅订阅十多年,还参照看央视“拳王争霸赛”。别人看拳击“残酷”、“血淋淋”,我看到的却是“磨砺斗志、激发血性、永不言败”,看到的是人生、是哲学!如今,我已有上万册书籍,几个屋堆得满满的,甚而有些“乱七八糟”,但总觉得书香四溢,充实无比。我常开玩笑地说:“我是将别人打麻将输的钱买书,将别人打麻将的时间看书”。有这么多书作伴,斗室之间,可以同古今中外众多的高尚灵魂对话,可以陶醉于诗歌小说,可以自由自在游览天下名胜大观,汲取知识,开阔视野。更重要的是,远离功利,摒弃沽名钓誉,把读书当乐事当欣赏当修身养性,轻松愉快,神清气爽,心旷神怡,浑身充满正能量。

一位哲人说过,世间最神奇的事莫过于阅读。斯言诚哉!



淘书讲缘分

□成义

我喜欢淘书,自认为淘书像找女朋友,是靠缘分的,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。

九十年代中期,是我淘书最疯狂的时候,那时,西街大梨树老巷里有好几家旧书铺。我在安顺晚报做记者,办公室在大府公园内,下午起完稿子,就去走街串巷,每次都无心插柳,回家都会抱着一摞书回家。

我的书架上,像周作人的《谈虎集》、梁启超《清代文学概论》、夏济安翻译的《美国文学选》、民国版的《酬世文库》、线装书《五十期诗文》等都是淘来的。

周作人的《谈虎集》是四十年代的老纸本,北新书局出版,32开,很有书卷气。北新书局是1924年在北京成立的一家民营书店。老板李小峰,周作人和鲁迅两兄弟的书大多在这个书局出版。《酬世文库》是棉纸本,民国初年出版,光是书中的内容用铅字印成小书就美得不得了。

在《美国文学选》,美国作家的理性和诗意,文学既感染又动人。夏济安的翻译很是典雅,如他翻译欧文《西敏大寺》的开头:“时方晚秋,气象肃穆,略带忧郁,早晨的阴影和黄昏的阴影,几乎连接在一起,不可分别,岁云将暮,终日昏暗,我就在这么一天,到西敏大寺去信步走了几个钟头。”

这是我极喜欢的文字,通读之下,意犹未尽,大呼过瘾,才发现这只是上册,而此书是今日世界社出版社的,是改革开放引进的外版图书,作为大学研究用,印数仅千册。哪里去找?

虽然如此,时间流逝,这样过了两年,偶然间,我在贵阳街头一家旧书摊看到下册,正巧没有上册,店主索价10元,不用考虑,索性买了下来,终于完璧。对我书架上的书来说,他们好似多年失散

小人书里旧时光

□何旭

那个周末,我回乡老家,无意中从柜子里翻出一本已经泛黄的连环画。恍惚间,那些童年旧时光重现脑海。

记忆中的小人书虽只有巴掌大小,内容却包罗万象,有民间传说、现代故事、科幻小说、中外名著、还有电影戏剧……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,几乎每一种文学形式的作品,在小人书里都能找到它的影子。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在小孩眼里,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小人书也是一种奢侈。那时,在学校门口有一家小人书出租店。狭小的店面里,四面的墙上都是定制了木书柜,上面摆满了花花绿绿的小人书。店主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,一身洗得褪色的中山服,上衣口袋里别一支钢笔,一看就是个文化人。他坐一个马扎,面前放一个盛钱的旧铁盒,那时到店里花一两分钱,就能租一本小人书。

那时,同学们到书店租了小人书,都是争分夺秒地交换着阅读,你用《敌后武工队》换我的《水浒传》,我用《平原枪声》换你的《地道战》,各取所需。一本小人书,往往经过无数次的传阅。那时,在手里借来借去的都是一些单本的,或一套中的几本,没头没尾。如果借全了,往往挑灯夜战地看完,不然第二天还书就看不

的夫妻得到重逢,我也为他们高兴。我隐隐感觉,淘书也讲缘分,仿佛冥冥中似有助。

因此会有人说,淘书像泡女朋友,一要有空闲,舍得时间成本,二要有耐心,软磨硬泡。

九十年代,安顺人星期天还时兴赶花街,把家里没用的旧物件拿出来卖,有事没事要去逛逛,妻子戏说我前世肯定是收破烂的。可是我就买到很多珍贵的旧书。

一次赶花街,就见到一位红毛蓝眼的老外,脚下放一个蛇皮口袋,里面有上百本书。嘴里喊着sale!此人不知何方人士,竟也学起安顺人卖旧货。其实,对他们来说,这种市场早已有之,他们叫flea market(跳蚤市场)而已。

我那时在学英语,用安顺话说话,就冒皮皮上去搭讪几句。老外一听很高兴,言在安顺师专做外教,期满回国,剩下这些旧书无法处理,才拿到市场来卖。还说,不论价钱多少,只要这书有用途就行,总比化成纸浆强吧。

我翻了翻,全是英文原版,安顺小城开放程度不像大城市,难怪没人买。我花了50元挑了20多本,有《老人与海》、《老枪》、《古希腊神话》、《美国中学语文》等等。

回到家仔仔细细翻,这些都是上好的铜版纸,印刷精美,插图是当代欧洲艺术家作品,当即后悔没能全买下来。第二个星期天想再去买,到花街去,希望又见到那位老外,可就再见到踪影了。

现在我有时候也学年轻人用手机阅读,想想过去淘书的趣味,有些怀念。我想,现在旧书铺怕是没了。现在的手机阅读模式,没有人会淘书了吧,可是我知道现在日本还有很多旧书店,淘书的人不少,旧书业是日本的一大产业。

开卷有益

□邓克坚

“世界读书日”刚过去,但读书活动却永远不会停歇。不论走进校园、走进机关、走进军营、走进企业、走进农家,只要见到人们正专心致志捧书而读,那绝对是令人愉悦和感动的靓丽风景线,即使你见到的是读“电子书”的年轻人,正享受着数据化时代的快乐,在点读电脑、手机上的信息,会让你不能不感叹这“读书”的巨大诱惑力,从而为之震动。

我本算不上“读书人”,在此谈读书,实属“门外汉谈”,至多是小有所感,一吐为快罢了。

李克强总理倡导全民共创“书香中国”,意义重大,得到全国文化界、教育界、知识界的赞誉,得到莘莘学子们的响应和家长们的支持,书香正“润物细无声”地滋润着潜藏在人们心田之中的智慧之花,读书正成为当代人们的一种文化觉醒、文化自觉、文化正能量,已成为一种生存、生活、从业、创造的需要。应该说,读书的常态化、读书的蔚然成风,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温度计和试金石。正如莎士比亚的名言“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;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”。

有一位大学校长曾给刚踏进大学校园的新生支招出点子“你如果聪明,应当学会充分利用大学的资源,譬如每所大学的图书馆,好比古今中外知识的富矿,就看你会不会去挖掘、善于去利用。”话语言简意赅,语重心长。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如何,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看它有没有高质量的图书馆和博物馆。

我们安顺也有一个图书馆,藏书量也许不到20万册,但它的作用也不可小觑。这里,我想举个例子,这个图书馆的前身原来是在南街一座平房小院中,当年有一位读者曾是图书馆的常客,开馆即来,关门才走,风雨无阻,持之以恒。“文革”后,恢复高考,这位读者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,荣获第一名,以优异成绩得以进入北大攻读深造,毕业后留校任教,成为著名教授,成为研究鲁迅的大家,学有所成,名声大振,他的学生们,大都才华横溢,蔚成大观。这位“读者”叫钱理群,安顺文化教育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诚然,钱教授的成功之路因素多多,但他当年在安顺图书馆潜心读书的经历和积累,想必是成功的因素之一。

据我所知,安顺的书迷不少,时常关注新书出版信息,喜欢逛书店,喜欢购书,喜欢读书,乐于藏书,平常间生活节俭,但见到中意的书,再贵也舍得花钱去买;如若买不到,也要想方设法去寻来品读,谈起书来,精神为之一振,眼前为之亮,感悟一触而发,有意无意间潜移默化,获得许多知识,感觉欣慰充实。

我家中的书架上最多不过2000册书,与友人们相比,十分汗颜。不过,我也曾产生过读书后得以启迪的激动,举个例子,我读过《曾国藩传》,书中有个篇章,谈及曾国藩这位汉族的智者,在清廷做官,成为一品大员,谈何容易,时时处处言行谨慎,如履薄冰,他有过深刻的体验:每逢事事遂意、一帆风顺之时,往往是他大祸临头之日。所以,他对“圆满”反而提心吊胆,敏感于“月满则亏、水满则溢”,觉得人生有些不如意反而是好事,平安是福。为此,他心甘情愿“求阙”(求缺),乃至将他的住所命名为“求阙斋”以时常自省……。读了这本书,给我带来许多思考,细细品味,很有哲理,虽时隔多年,这个细节总留在我的记忆中,挥之不去。

前不久,我到安顺一中去,见到老槐树的后侧高耸一座崭新的图书馆,名曰:“羲之楼”,感慨万端,据我所知,早在1942年叶玉岩先生任校长时,安顺一中还称为“省立安顺中学”,邓羲之先生鼎力资助,建起了一幢“羲之图书馆”,后来在校园建设中拆除了,2006年,一中百年校庆时,羲之先生的四子邓廷琮先生也从香港赶来参加校庆活动,见父亲捐建的图书馆不复存在,回去后即慷慨解囊,捐资200万,支持一中建设新的图书大楼,眼前的“羲之楼”已建好,投入使用。父子两代人,两建图书馆,在安顺传为佳话,一中的学子们登临楼中读书,环境条件十分优越,如不认真攻读,真乃愧对先贤矣!借此机会,我也真诚地为故乡学子读书作奉献的先贤们表示崇敬之情。

一个作家要写成一本书,“看似寻常,却很艰辛。”尤其是世所公认的经典大作,作家更是倾其毕生精力,那是他一辈子的成果、智慧的结晶,后人如得一睹,已是万幸。常言道:“取法乎上,得乎其中;取法乎中,得乎其下。”书籍浩如烟海,谁也读不完,如若选准一些好书读,绝对是“一本万利”般的收获。读书的重大意义,古今中外的仁人智者多有阐述,无需重复赘言了,我辈如有兴致,还是静下心来读几本书吧,真不能像诗圣杜甫那样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若有神”,但有一点是笃定不会错的:开卷有益!

书非借不能读也

□王有林

2015年4月23日是“世界读书日”成立20周年纪念日,由此,我联想到我与书结缘的故事,那是我第一次借书阅读的难忘经历……

时间要回溯到“文革”末尾那一年(即1976年),我就读于安顺地区实验学校小学二年级,有一天,在我们班上,有一位姓邓的同学从家中带来一本书名叫《红色娘子军》的连环画彩色版图书,内容反映的是芭蕾舞剧的“红色娘子军”的斗争故事,一下子吸引了全班同学的注意力,大家纷纷围观观看。邓姓同学瞬间成为“最”受欢迎、“最”为牛气和“最”具权威的同学。由于我平时与邓姓同学关系最好,在我的软磨硬泡和“威逼利诱”之下,邓姓同学被迫将图书借予我阅读一天,但是,他再三嘱咐我:一、此书是他从父亲处“偷”来,必须要保护和爱惜好;二、借书时间只能是一个晚上,第二天上学时必须归还他;三、如果他书弄丢了,他会遭到父亲的“毒打”,他就要和我“绝交”。为了能够借到图书,我满口答应。拿到图书的那一晚是我最为开心的时候,我手捧图书翻来翻去,重复阅读不下十次,生怕放下此书,走到书包跟前拿起书本开始做家庭作业……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图书,但是,有很多图书我都没有完完整整的阅读过一遍,我在想:是什么原因、是什么心境导致我远离书香的呢?思忖多年,我一直没有寻求到答案,难道真如古人说的“书非借不能读”吗?由此,我联想到:借书与借钱的道理可能是相通的,当我们借别人的钱消费时,也许我们会精打细算的使用(还要时刻提醒自己尽早归还),而当我们借别人的书阅读时,我们想到的是要尽快归还,于是我们就在第一时间完整的阅读一遍、阅读二遍甚至N遍,那么,如果我们都到公共图书馆去借阅图书(图书馆的藏书比“别人”丰富得多得多),我们的阅读效率必定大幅度提升,我们的“书香社会”必定会形成。

前几日,我看到一份相关调查资料:在新中国建立以前,有多达90%以上的人祖祖辈辈都不识字,更不遑论阅读图书了。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,脱掉了“文盲大国”的帽子,绝大多数中国人认识了文字、看得懂图书,这是多么了不起的“文化”成就啊!但是,当今的现实中国,随着科技日新月异,新兴媒体(如网络、电视等)铺天盖地,知识信息良莠不齐,导致现代人患上了“懒阅读”、“怕阅读”、“恨阅读”的阅读综合症……

我不想规劝大家放弃手机、放弃电脑,在这里,我只想呼吁:从我的阅读经历来说,科学的知识讯息是图书记录的优势,因为它是作者穷尽一生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,它是知识真正的力量源泉,我希望有更多的“读书人”有“书非借不能读”的意识,走进图书馆,畅游知识海洋,共建“书香社会”……